

李烛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怀

赖明勇 段安娜 夏再军 刘明



2022年是著名爱国民族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重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烛尘先生诞辰140周年。

李烛尘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长起来的老一辈民主党派人士,在中共团结、引导和帮助下,他逐步认同和接受中共的思想主张,拥护中共的领导、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坚持与中共风雨同舟、亲密合作,共同致力于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彰显了彪炳千秋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情怀。

在中国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他为民族化工工业建立和发展、争取抗战和解放事业胜利、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工作,并充分利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影响,广泛宣传中共方针政策,团结引导民族工商界恢复生产和发展、支持抗美援朝、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效力。他先后担任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部长,为民族工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重庆谈判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沧白堂事件”,李烛尘公开反对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破坏活动及暴行。震惊中外“较场口事件”发生后,李烛尘与王若飞、董必武等11人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与国民党政府开展了有力的斗争。1946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企图以“改组政府、制定宪法”为诱饵,拉拢民主党派、孤立共产党。被授予“国大代表”头衔的李烛尘没有出席会议。

同年,他回到天津,积极组织民族工商业者上层人物成立“工业协会”,积极宣传中共政策和人民解放斗争形势,帮助大家识破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真相,公开抨击国民党反动政策,破除工商业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幻想,打消工商业者对中共的顾虑。同时组织工商界活动家,团结工商业者反内战、反独裁,反对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官僚资本巧取豪夺。

平津战役拉开序幕后,李烛尘日

夜奔走,各方宣传中共政策和革命形势,安定了民族工商界的人心,稳定了市面,并力劝警察局长李汉元释放全部在押人员,解除全部警察武装,下令各分局及保安大队维持治安,防止发生破坏和抢劫,维护了天津的稳定。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为消除民族工商界存在的崇美、亲美、恐美心理,提振爱国思想,李烛尘组织天津市4万余名工商业者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他不顾69岁高龄,亲自担任总指挥,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李烛尘还发动天津工商界捐款1500亿元(旧币),购买飞机100架,自己还为首批入朝的近三十万志愿军将士每人捐赠毛巾一条、茶缸一个。

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早在1943年,周恩来就委派徐冰(邢西萍)与在重庆的李烛尘建立联系,还邀请他参加各解放区的展览,使其对中共有了初步认识。李烛尘在《大公报》和《新华日报》上公开欢迎毛泽东来重庆和谈。1945年9月17日,毛泽东在重庆桂园举办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李烛尘、刘鸿生等人时,公开赞扬他们为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在离开重庆前,毛泽东单独约见李烛尘就餐,毛泽东再次称赞:李烛尘先生和范旭东先生创办化学工业,对国家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包

矢志实业救国

李烛尘24岁走出湘西大山,考入熊希龄创办新学的常德西路师范学堂理化科学习,深受维新变法新思想的影响,开始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1912年,李烛尘东渡日本学习电气化学专业,并立下“实业救国”的志向。1918年从日本学成归来,与范旭东、侯德榜等一起创办久大精盐厂、永利制碱厂,并在民族工业界首创“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成立三位一体的“永久黄团体”,成为当时东方最大化工企业集团、民族资本企业集团。永利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打破英国财团对中国市场垄断,使民族化工工业在恶劣环境中发展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烛尘断然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耗时近两年将“永久黄团体”数万吨机器设备及数千名员工及家属全部转移到四川,在抗战后方创立了民族化学工业中心。抗战时期,李烛尘等以民族利益为重,不断改造制盐技术,全国的军需民用盐几乎全部来自他们生产的川盐。作为“永久黄团体”主要创建者之一,李烛尘凭着满腔爱国热忱、一身民族正气、百折不挠的韧劲,开创了我国民族化工工业,并为民族化工工业崛起培养了一支具有当时世界水准的技术人才队伍。

新中国成立之后,李烛尘在中共领导和指导下,积极参与全国工商联建

《黄炎培日记》中的陈嘉庚

董立功

黄炎培与陈嘉庚都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两人都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都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民族内忧外患,两人共同选择用兴办教育来挽救民族危亡。

黄炎培有写日记的习惯。黄炎培日记时间跨度长达50余年,字数累计700余万。黄炎培日记中一共有40余处提到了陈嘉庚。这些记载是二人长达40余年深厚友谊的见证。

从相见到相识

黄炎培与陈嘉庚二人相识于1917年黄炎培南洋之行期间。当时陈嘉庚就意识到,黄炎培将来一定能对自己在国内的办学活动提供支持。1917年8月出版的《教育与职业》杂志刊登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永久特别社员姓氏录》,陈嘉庚因捐“叻银一万元”而当选为永久特别社员。《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第七条规定,“凡一次纳特别捐200元以上者为永久特别社员”。陈嘉庚所捐的叻银一万元远超这一标准。陈嘉庚的慷慨之举令黄炎培十分感动,二人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19年1月25日,黄炎培因为要替中华职业教育社征求特别赞助会员并考察侨民教育,再次前往南洋各地。2月7日,黄炎培抵达新加坡。甫一登

岸,黄炎培即被陈嘉庚和周俾霖所派二人接至林义顺处。之后数日,陈嘉庚的名字几乎每天都出现在黄炎培日记中。据2月7日的《黄炎培日记》载:“在道南晤陈嘉庚,访之于谦益号。与谈中事。”2月8日的《黄炎培日记》载:“晨,陈嘉庚同观中学校舍、橡皮厂。”

黄炎培此次南洋之行长达两个多月,于4月25日晨7时离开。不过,在黄炎培离开新加坡前,曾于4月21日、22日与陈嘉庚有过两次长谈。在这两次长谈之际,陈嘉庚向黄炎培透露,他即将回国在家乡厦门创办一所大学,并委托其帮忙物色师资。

从相识到相知

1919年7月23日,黄炎培按照他与陈嘉庚的约定来到厦门。黄炎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晨六时抵埠,陈嘉庚遣人迎至陈氏祠相见。祠在浮屿。”

在黄炎培抵厦的10天前,陈嘉庚就是在浮屿的陈氏宗祠发表演说,说明他筹办厦门大学的目的和经过。他当场宣布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和常年费300万元,这个金额相当于他当时的所有资产。

黄炎培的到来给了陈嘉庚更大的办学信心。7月23日上午,陈嘉庚把黄炎培带到南普陀寺旁的演武场。当天中午,陈嘉庚向黄炎培畅谈了他的

办学设想。据当天的《黄炎培日记》载:“午,与陈君谈未末事,集美事,皆陈君延翻译。”

当天下午,陈嘉庚将黄炎培带至鼓浪屿华侨富商黄奕住处。在黄奕住家吃过晚饭,陈嘉庚与黄炎培一起返回位于浮屿的陈氏宗祠,二人又是一通畅谈,直至晚上12时才依依惜别。

黄炎培这次一共在厦门停留了5天。停留期间,黄炎培与陈嘉庚可谓“形影不离”。7月25日,二人“观通俗教育馆,幼稚园,女学校。”7月26日夜,黄炎培“为陈君展陈对于集美及未来大学之意见,至十二时三十分始罢。”7月27日,因为陈嘉庚要去漳州,二人“共摄影于祠之庭”,依依不舍分别。

7月28日,黄炎培登船离厦赴沪。在途中,他写下了著名的《陈嘉庚毁家兴学记》,这篇文章后来被《东方杂志》《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等杂志广泛转载。

共为团结抗战出力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抵达重庆,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慰劳之旅。在重庆期间,陈嘉庚曾数次和黄炎培促膝长谈。3月31日,陈嘉庚再次出现在了黄炎培的日记中:“午,雪艇、枚君招餐,晤见陈嘉庚、庄西言及译者李君铁民。四时,参政会茶会,听嘉庚演说。自抗战至廿八年底,南洋华侨捐

括李烛尘在内的民主建国会领导层抛弃“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道路,赞成中共“五一口号”。1949年5月,毛泽东写信邀请李烛尘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6月,新政协会议第一次筹备会议召开,李烛尘作为产业界的代表参加会议,并参与共同纲领和宣言起草小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中共领导下奋斗在新中国的建设第一线,矢志不改爱党爱国之心,毫不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与中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爱国主义思想熠熠发光

李烛尘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情怀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折射出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背景下追求国家独立、民主、富强的鲜明特色。尽管时过境迁,仍然熠熠发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内忧外患的旧中国,李烛尘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实业才能救国,于是师夷长技,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创立“永久黄团体”,从事投资数额大、周期长的基础化学工业,虽面临技术设备复杂、突破国外资本主义大公司垄断技术艰难等困境,但仍凭着一腔爱国情怀和“九死而不悔”的勇敢,咬牙坚持、开拓创新,最终“破茧成蝶”,开拓了我国民族化工工业。

在旧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制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挤压,永利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畅销国内外时,英日帝国主义就想想方设法通过合作、增加盐税、降价等各种途径来打压永利,李烛尘等与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七七事变”不久,永利、久大被迫停工,日本军部属下的兴中公司曾预先拟好“合作”协定文本,逼迫李烛尘签字将永利交给兴中接办,遭到李烛尘严词拒绝,他大声斥斥道:“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东西还要物主签字的道理”,表现出老一辈民族企业家临危不屈、勇于抗争的崇高气节。

作为老一辈民主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李烛尘是“紧跟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忠实践行者。可以说,李烛尘从一个爱国民族实业家到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再到国家领导人的人生经历及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长期政治引导和政治吸纳,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萌芽、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结出的丰硕成果。

(本文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湖南省委主委赖明勇,民建湖南省委专职副主委段安娜,民建湖南省委宣传联络处处长夏再军,湖南省湘西州政协委员刘明)

款共二万万零五百万元,侨胞每人财产捐2%。”

陈嘉庚对国共团结抗日问题极为关切。他说,国共若不幸破裂而内战,则华侨公私汇款必将冷淡。陈嘉庚希望黄炎培以调解人之一的身份多出力,推进国共和谈。

1940年6月1日,陈嘉庚终于冲破重重阻挠,在延安杨家岭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同一天,黄炎培向重庆国民政府建议由陈嘉庚来担任“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讯孔庸之,请决推陈嘉庚为募债会副委员长。”

不过,后来担任副委员长职务的并不是陈嘉庚,而是孔祥熙。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黄炎培惦记着尚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安危,立刻致电询问情况。1942年1月15日,黄炎培收到了陈嘉庚的复电。他在日记里写道:“得陈嘉庚新加坡复电。华侨抗敌动员会已组成。”

1942年2月1日,日本开始进攻。陈嘉庚不得不于2月3日逃离新加坡,黄炎培也随即和陈嘉庚失去了联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二人中断的联系才得以恢复。

梁实秋与陈嘉庚都是赤诚的爱国者。在晚清,他们都对国家主权沦丧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痛心。在民国,他们都对国家积贫积弱和国民政府的无能感到失望。在新中国,他们都积极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他们对国家和民族深沉的爱,是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他们二人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教育史的丰碑上。

(作者系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与瞿秋白是左翼文坛上的一对战友,是亲密无间的知己。

鲁迅与瞿秋白可以说是早已相互知名,又惺惺相惜。瞿秋白一直非常崇敬鲁迅先生,未见到鲁迅之前,他曾对茅盾说:“我读过鲁迅的很多文章,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文才。只是一直无以谋面,始终引为憾事。”同样,鲁迅对瞿秋白也是倍加推崇,他对冯雪峰说:“何苦(瞿秋白的笔名)杂文,明白畅晓,一览无余,真有才华,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论文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人。”

后来二人相逢,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此后,鲁迅在日记和函件中,经常提到瞿秋白的笔名,如何凝、维宁、宁华、它兄等。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写了短篇小说《豆腐阿姐》,很想拿给鲁迅看看,可又没有勇气。瞿秋白却不时地催促她:“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瞿秋白时常以家人的口吻,亲切地称呼鲁迅



孙犁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家。

孙犁先生的编辑生涯长达30多年,对于组稿、看稿、选稿、改稿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他主张编辑要“经常出去跑跑,不要只是坐在桌前,守株待兔”;而对待稿件,他更是以敬重的态度,“像对待远方兄弟的来信一样”。他早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稿件拆封时,注意不伤及稿件,特别不伤及作者的署名和通讯处;保持稿件的清洁,不给人家污染了;他从未丢失过一篇稿件,哪怕是很短的稿件。

看稿时,他也有种种“规矩”:阅读稿件时,先要擦净几案,然后正襟危坐。不用的稿子,有什么意见,写在小纸条上,不在稿件上乱画;他不愿积压稿件,总是很快地处理。至于选稿,孙犁先生主张“要严”,真正做到从质量出发。关于稿件的修改,孙犁先生主张“多就少改,不可妄改”,“可改可不改



1949年7月,杨沫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加之肝痛,怀疑得了肝癌,长期失眠,便在家休养。

在家躺卧病榻的日子里,她回想起在冀中十分区血与火的抗战生活,过去那些牺牲的战友,时不时浮现在她的脑海,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她暗下决心,要写本书,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这些烈士们的形象再现出来,永留人世。1951年9月25日,她草拟了全书的提纲,最初的书名叫《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

由于身体多病,又常头痛,她每天只能写两三千字。到1952年10月,初稿轮廓已经出现。1952年底,杨沫被调到电影局创作所当编辑,接触到了不少作家,她的艺术见解和写作技巧有了很大的提高。她原计划1953年9月底完成初稿。然而,1953年她到北京农村参加统购统销工作的蹲点,到1954年春天才结束。这样,直到1955年4月底,《烧不尽的野火》即《青春之歌》才全部完成,约35万字,耗时3年7个月。

1955年春天,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去了这部书稿,看完后拿不定主意,他们要杨沫找个名家看看,若肯定了马上出版。杨沫就由妹妹白杨介绍,



著名作家梁实秋在散文集《雅舍谈话》中,介绍了核桃酪、铁鸡蛋、瓦块鱼、溜黄菜……一道菜品即一篇文,谈美味以寄兴。

《雅舍谈话》是梁实秋的散文作品,写的是饮食文化,表达的是怀念。其中不仅记叙众多街头特色小吃的渊源、品相,更是将“吃”背后的饮食文化、“吃”之余的人生百态和“吃”以外的故乡情融于文章之中,诙谐典雅的文字间流露出一个个时代的滋味记忆。

梁实秋家境殷实,父亲梁诚熙对美食很有研究,经常带着年幼的儿子到厚德福饭庄吃饭。有一次,6岁的梁实秋学父亲喝酒,从此“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成为他追求的最佳饮酒状态。梁实秋祖母的早点多有燕窝、蛤什妈、莲子等名贵食材,在梁实秋的童年时光里,女佣戴着眼镜挑燕窝杂毛的场景记忆犹新。他的母亲时时要为祖母煮上一小薄饼的核桃酪,从泡发红枣、捣碎米到用黝黑的小薄饼慢火细煮,做出几小碗

鲁迅编文怀秋白

周二中

为“大先生”。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汀汀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瞿秋白英勇就义后,鲁迅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的信曾这样写道:“中国人是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随后,鲁迅等人商定要集资为瞿秋白出书,以资纪念。鲁迅撑着带病之躯,以顽强的精神,为亡友编校遗著《海上述林》。《海上述林》是瞿秋白的译文集。鲁迅亲自负责设计封面,编排校对,安排插图,选择纸张。不仅如此,鲁迅还写了短文,相当于广告词,内中说此书“足以益人,足以传世”。《海上述林》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霜”是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意即全中国人都怀念瞿秋白。

鲁迅悲愤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编辑家孙犁

王剑

者,不改;可删可不删者,不删”。编辑时,他总是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只删改一些明显的错字和极不妥当的句子,把标点弄好,然后衔接妥帖,使上下文通顺。对选用的稿子,他不只发表以前仔细看,见报之后还要仔细看一看,看看有无错排,别人有无改动。

孙犁先生认为,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应该是文字之交。编辑认真、负责、及时、稳妥地处理稿件,就是对作者最大的尊重;对作者“既要热情扶持、耐心帮助,又要严肃,不能迁就”。孙犁给全国各地的投稿者写了很多信,几乎有信必复,而且写得很有感情、很长。这些信都收在《耕堂劫后十种》的“芸斋短简”里,让人读后很有感触。

2002年,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设立了以孙犁命名的全国报纸副刊最高奖——“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这说明,孙犁的编辑成就,代表着当代报纸副刊的高度

杨沫几经周折的《青春之歌》

崔鹤同

找到了时任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生。可是,一直到年底,阳翰生也忙得没顾得上看。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又把杨沫审阅这部稿子。1956年1月底,书稿审阅后形成了一篇6000多字的审读意见,分析了手稿的缺点,优点只轻描淡写地提了提,等于否定了这部作品。

1956年春天,杨沫把书稿给了原来的同事、冀中十分区《黎明报》社社长,时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的秦兆阳。过了几天,秦兆阳说稿子挺好,已经转给了作家出版社。5月底,作家出版社责任编辑任大昕通知杨沫,在6月20日之前,只需对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并给她预支了1000元稿费。杨沫如期完成修改,全书约40万字。这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听说作家出版社要出,急忙找到杨沫,说他最先拿到这部稿子,答应以最快速度出版,请她和作家出版社商量。杨沫觉得还是在作家出版社出好,这是老秦介绍的,人家那么热情和重视,还预支了钱。

可是,到了年底,因为纸张紧张,出版社说要延期出版。这样,又过了1957年,一直到1958年1月,这部半自传体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历经了6年之久,终于面世,销售火爆,好评如潮,头版很快抢购一空,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美食家梁实秋

卞文志

令人口舌生香的暖心甜品。这样的情景,皆深深地铭刻在梁实秋的心里,为他之后成为美食家、写作与美食有关的文章打下了基础。

梁实秋在写文章时,总会想到美食与写作的相通之处,他认为:追求文字简洁,但又言之有物,还要有滋有味,这样方为作文的根本。

《人间食色,至味清欢》一书,是梁实秋关于“吃”的散文合集,北平街头巷尾贩卖的豆汁儿、酱菜、糖炒栗子,饭馆酒楼里的瓦块鱼、汤烧鸡、五柳鱼,友人家餐桌上的萝卜汤,母亲悉心熬制的核桃酪,每一道菜的背后,都有着生活的烟火气,也有远离故土后的淡淡乡愁。在此书中,梁实秋谈“吃”,妙在富有生活趣味的同时,还有各种信手拈来的典故和考据,爱吃、会吃、更懂吃,是这位“美食家”的人生主题词之一。透过梁实秋笔下这些或简或繁的食物和菜谱,我们看到的是悠远的历史,还有时间与文化的深厚积淀。